

“2017年上海人类学学会终身成就奖”得主、语言学家王士元

## 我们应当让语言自然地演化

本报记者 黄春宇



王士元(左一)在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

王士元,著名语言学家,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士,1933年生于上海。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开始研究语言学和人类学,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期间,创办《中国语言学报》,向国际语言学界展示中国语言学的研究。

通过对汉语方言的计算机分析,王士元提出了

“词汇扩散理论”。他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大量田野调查,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。他特别强调探索过去有三个窗口,分别是考古学、遗传学和语言学,并积极实践跨学科研究。

王士元说过:“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犹如画在沙滩上的线条,随着每一次先进知识

的波涛到来,这边界就会发生变化,甚至完全消失。人类的知识,特别是研究语言的知识,应该是彼此相连的,并且最终是相互贯通的。”

2017年11月,上海人类学学会授予王士元年度“终身成就奖”,以表彰他在语言人类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。颁奖礼后,王士元接受了本刊采访。

## 学问不只是一门语言,而是语言背后的东西

**文汇报:**首先祝贺您,被上海人类学学会授予象征人类学终身成就的“金琮奖”。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份荣誉?

**王士元:**评委会跟我说,要给我颁这个奖,当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,因为我的这辈子还没有结束啊。这时我就想起美国诗人 Robert Frost(罗伯特·弗罗斯特),他写过一首诗 *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*(《雪夜林边小驻》),最后一句是“The woods are lovely, dark and deep/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/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(树林静谧,深邃幽暗。心虽向往,可是我还得如约向前赶。安眠之前依然长路漫漫)”。诗人把树林比作死亡之后要去的地方,同样我也感觉到,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没有做完,怎么就判定是“终身成就”了。当然,我很感谢上海人类学学会,认可我已经做的事情,但是我希望今后还能做更有用和更重要的贡献。在颁奖礼上的演讲中,我最后提到了人口老化现象,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,经济上、感情上,以及家庭与社会的各个层面。我想通过语言的角度来了解,当一个人逐渐老去的时候,他的认知是如何一步一步消失的?“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”,我还想多研究一些人的夕阳时期。

**文汇报:**人的老化与语言的退化,这确实值得我们关注,那么您的研究进展得顺利吗?

**王士元:**我们利用磁共振

和电波曲线,对三类人进行比较,分别是老年人、中年人和大学生,看看都有什么变化。找到变化以后,跟认知、语言联系起来。如果我们了解了变化的原因,就能设计一些实验、软件或是电脑游戏,帮助老人进行自我训练。如果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,第一步是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,现在尚未找到问题的根源,还在做一些很基础的工作。我原来在香港中文大学,后来发现香港理工大学有个康复科学系,在这个领域的实力很强,所以搬了过去。现在注重老化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,尤其是欧美国家,我想国内应该也有同行在从事这方面工作。一般的研究是在医学领域内开展,而我关注的是语言。

**文汇报:**转眼间,“词汇扩散理论”的问世已有近半个世纪。最早是1969年,您在美国《语言》杂志上发表“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(《竞争性演变是剩余的原因》)”,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理论。

**王士元:**最初我是和郑锦全、陈渊泉、谢信一等等一起讨论这些语言变化的问题,渐渐形成了词汇扩散的想法。这跟欧洲的新语法学派的主张正好相反。我的看法是语音变化本身往往是突变的,在整个语言的词汇里却是渐变的,是通过一个一个词实现的渐进式的改变。新语法学派的传统观点坚持语音是渐变的,词汇是突变的,是一下子改变的。那时人们更熟悉新语法学派的观点,所以我们提出的主张引起了不少争论。1981年的美国语言学会会长、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(W. Labov)认为词汇扩散理论至少在辅音变化上是绝对可

信的,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各自研究中找到了支撑这个理论的证据。与此同时,人们也可以用这个理论来研究语言中别的系统的变迁,例如句法上的变迁。再往后,我们加深了对于语音变化的理解,“词汇扩散理论”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也有了更广泛的认识。

**文汇报:**您提出的“词汇扩散理论”,在学界被公认为语言演化研究中最重要创新理论,而您一开始学的却是电子工程。

**王士元:**我没想到会走这条路。在纽约时,我和几个朋友去中国餐馆吃饭。他们要我点菜,但是饭店里的老板和伙计都说台山话,不会普通话,所以我们没办法交流,最后还是用英文点了菜。朋友们觉得不可思议,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,怎么会听不懂对方的话呢?当时我还没有很认真地研究语言学,对于这个问题仅仅停留在好奇层面。等到进入研究院,我的老师高登·皮特森(Gordon Peterson)是一个语音学的权威,他就告诉我们,音是怎么发出来的、什么语言里有什么音、哪些语音上的区别比较重要?就这样,我的博士论文转到了那个方向,以前学的电子工程就是分析一种波形的现象。再往后,我又意识到,语言不只是语音,语言包括大量的词汇,不是把这些词随便放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句子。比如“今天我去”而不是“去我今天”。慢慢的,我的视野就打开了。念完博士,俄亥俄州立大学邀请我过去,让我帮他们创办一个语言学系。我说我可以来,但最好是两个系,一个语言学系,一个东

亚语言系,我希望学习中文的人越多越好。现在是英语的世界,国际上的学术研究和交流都离不开英语,将来会说中文、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达到一定的规模,中文也就变成一门国际通行的语言。

有些事,说起来简单,做起来并不轻松。我有教中文的想法,但是出国时,我还是一个中学生。那个暑假,我很辛苦,不停地死记硬背。卷舌音 zh、ch、sh、r,我都不会,韵尾的 n 和 ng 是不同的,但对于安徽话和上海话(我生在上海,小时候在安徽长大)来说,没有区别。等到夏天过去,我终于可以说一口比较像样的普通话了。

在研究语言的同时,我开始关注汉语,包括语法、历史,等等。正因如此,我认识了很多老前辈,像赵元任、李方桂,他们都对我非常好。有一天,赵先生跟我说,“俄亥俄不够国际化,你到伯克利来吧”,于是我去伯克利。赵先生在东亚系,我是语言学家,汉语是我的兴趣之一,所以选择了语言学系,一呆就是三十多年。

**文汇报:**很多年前,您就提到了西方学者习惯于以欧洲为中心(Eurocentric)的思考方式,这会导致学术上的偏见,这种情况是否有所改变?当代的中国学者又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,尤其是身处英语占主导的世界?

**王士元:**过去这些年,情况有所好转,但是还不够。一所大学要引进人才,怎么知道这个候选人的学问好不好?常见的做法是将 citation index(引文索引)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,这就需要英文的书写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学问很好,研究中国古代历史、考古或是哲学,但

是拿不出 citation index,那就要吃亏了。进了学校,从讲师、助教、副教授到教授,每一次升职, citation index 同样不可缺少。内地的学校我不是太了解,我在香港的城市大学、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都教过书,这个系统基本是那样子的。我从国外回来占了很多便宜,但是看到很多非常有学问的中国学者没能过这一关,不免替他们感到惋惜。我希望将来这两方面都可以改变:一是全世界更重视中文;一是学校的行政人员更新观念——学问不只是一门语言,而是语言背后的东西。

**文汇报:**在一篇文章读到,您的朋友认为“语言学家是踩在前人的脸上”,以此来证明语言学理论的不成熟。

**王士元:**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书时,有个数学系的朋友跑来调侃我:“我们学数学的站在前人的肩膀上,你们踩在前人的脸上。”语言学这个学科确实不够成熟,往往会出现一种现象,即谁会讲话、谁权力大、谁有魅力,就变得风靡一时,大家都跟着他走。这当然是不对的,我们要遵循学术上的标准。一个人说的话有没有道理,能不能拿出证据,证据是否充分,等等。语言学在慢慢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,相比过去有了不少进步。这次到上海来,跟复旦大学的金力先生聊了聊,我就很高兴。他不是搞语言学的,但和我一样,认为跨学科非常重要,要了解人就要了解人的语言,也要了解人的基因,而基因研究是他的本行。语言、基因、历史、演化,都应该放在一起研究,尽可能地拓宽视野。在